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41

2007年7月4日

也談模式和前途 —— 讀謝韜近作有感

(美國) 波士頓大學 曹天子

最近讀了謝韜同志寫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¹ 還看了對李銳同志的訪談² 和謝韜近年來寫的其他幾篇文章，有很多感想。現在把這些感想整理成文，以便向謝韜、李銳等前輩和其他關心有關問題的朋友請教。

謝韜近作正面闡述了他對(1)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2)第二國際、第三國際、蘇聯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3)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和(4)中國改革的得失及應當採取的模式等重大問題的看法。他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的

¹《炎黃春秋》2007年第二期，第1~8頁。下面引文，除特別指明外，均出自該文。

²《炎黃春秋》2007年第二期，第9~15頁。

改革，應該與第三國際的暴力社會主義傳統徹底決裂，回到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以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自己的目標和旗幟，“保留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發展生產力，實行民主憲政，“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這一觀點，雖屬近年來政學產媒精英聯盟的主流話語，但以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進行論述，卻似乎還是第一次，因而具有極大的衝擊力，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評論。

一些自由主義者，對謝韜的立論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立足於公有制和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其本質就是暴力和極權，是造成野蠻和落後的根本原因；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只有在認同普世文明價值（私有產權、個性、人權、自由、憲政民主等）的基礎上，通過建立三權分立的現代國家，發展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可是，西方社會民主黨人認同的這樣一種現代國家和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他們認為，想用社會民主主義來改造共產黨、挽救共產黨，純屬空想，根本不可能。他們問道，你肯放棄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嗎？沒有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現代國家，就沒有真正的自由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有個性的自由發展和公民的民主權利。結論：謝韜的高論，不是痴人在說夢話，就是蓄意騙人的鬼話。

一些堅守第三國際教條的左派，則更是感情衝動，直截了當地把謝文斥為反共毒藥、把謝韜斥為反共騙子。他們的理論武器主要是列寧對第二國際的批判。

謝文提出的問題，如對資本主義的成就和局限，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對第二第三國際的歷史經驗，對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對改革的成就和未來，究竟應該怎麼看，十分重要，值得

認真思考。可是上述把謝文妖魔化的做法，卻無助於獨立思考和認真討論。謝韜的文章，和所有人的文章一樣，不但是特定的理論視角的產物，同時也必然會受制於作者獨特的（個人的、民族的和歷史的）經驗背景。因此，要對這些問題認真討論，就必須從理論和經驗兩個方面入手。

一、馬克思主義

謝文的主題是執政黨的思想政治綱領；背景是其市場取向的改革實踐與傳統的意識形態承諾間的鉅大鴻溝，以及由此產生的黨內話語權問題：用謝韜的話來說，改革派只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嚴格說來，這一說法不是十分準確。由於“不爭論”，改革派享有實際上的話語權，即有些人所謂的改革派的“兩個凡是”：（1）凡是改革的就是正確的；（2）凡是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只有通過（沿著既定的改革方向）深化改革才能解決。對改革的種種非議，雖然長期存在，在“兩個凡是”的壓力下，基本上處於半非法半地下的狀態，並沒有真正的话語權。不過，謝韜的說法空穴來風，非無因由。只要執政黨不正式地公開地放棄原有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承諾，以這種承諾出發對改革提出的非議，總是具有某種思想上的合法性。特別是當改革遇到嚴重挫折、弱勢群體的不滿迅速增長時，這種非議，顯然會挑戰現有的改革方向，並威脅到改革派的執政權。出路何在？或者說，怎樣才能徹底取消挑戰派潛在的話語權？這正是謝文想要解決的難題。

答案是：撥亂反正，回到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這才是出路。謝韜認為，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奉行的（以暴力革命、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主要特徵的）暴力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不是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只有第二國際奉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謝韜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全新解讀，如果成立的話，當然能給市場取向的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可是，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樣，這一解讀立即遭到左右兩方面的非難和抨擊。我不同意那種妖魔化的抨擊；但我也不能全部同意謝韜的解讀。

關於馬克思主義，2006年2月，我曾寫過一篇短文，簡要地概括了自己的理解，在小範圍裡傳閱過，現在把它附於文末供參考。這裡僅就謝文著重討論的涉及社會主義的部分，做些評論。

謝韜說晚年馬恩有和平過渡的想法，這當然是對的。但要說晚年馬恩徹底放棄了暴力革命思想，說列寧毛澤東的暴力革命是修正主義，從文本依據和學理結構來看，難以令人信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需要有各種條件的配合；迄今為止，並無成功的先例。僅有的一次較為認真的嘗試，是1970年11月智利的社會主義者阿連德通過選票上臺。但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的支持下，隨即在1973年發動了軍事政變；進步人士血流成河，阿連德本人也命歸黃泉，和平過渡當然成了泡影。此後，雖有一些反對暴力革命的歐洲共產主義者，在富有議會民主傳統（這是和平過渡的必要條件之一）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提出過結構改革論，但不久也就銷聲匿跡了。

可是，謝韜會說，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福利國家為特徵，以瑞典模式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不是已經通過議會道路風靡西歐、征服世界了嗎？問題在於，能不能把社會民主主義看成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本身就是一個有待論證的命題。

衆所周知，馬克思對市場的盲目力量，持極端否定的批判態度。這一態度是否正確，是另一個問題。但要把以市場為其經濟運行的基本體制的社會民主主義，認作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困難

不少。

更重要的是，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固然有繼承發展的一面，主要指科學技術的發展創新和工業大生產的組織管理；但更有推翻消滅的一面，主要指僱傭勞動制度的廢除和僱傭剝削的消滅。沒有對僱傭勞動的否定，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可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儘管在二次分配（社會保障、福利國家，等等）上有所作為，但在首次分配問題上，卻仍然以僱傭勞動制度作為其基本經濟構架。也就是說，就基本經濟制度而言，社會民主主義完全立足於資本主義，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

可是，謝韜斷言，晚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通過股份制已經“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並提出了兩點理由。這兩點理由，實際上是論證當前國企改革（的方向和主要途徑）的最終理論依據，因此值得稍加評論。

謝韜說，（1）股份制“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作為從事經營管理的勞動者——引者所加）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了；（2）並進而引用《資本論》第三卷，說馬克思由此認為，股份制是“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³ 謝韜的結論是：體現晚年馬恩對資本主義研究最終結論的“《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

股份制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在

³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04頁。

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確實意義重大。可是，兩權分離，只是資本產權內部的分割，對資本剝削勞動的僱傭勞動制度，並沒有任何觸動。以前由古典資本家獨佔的利潤，現在由資本所有者（股東）和資本控制者（經理：中國以前叫做資方代理人）分享。⁴ 工人受剝削的事實，並沒有因為股份制的出現，而有任何的改變。當代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絕大多數實行股份制。如果因此而把它們稱作社會主義企業，概念上似欠嚴謹。

應該強調指出，晚年馬恩只是把股份制看作“一個過渡點”，通過它有可能“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很明顯，他們並沒有把股份制本身看作是新的生產方式。這裡，“過渡”是一個關鍵概念。只有過渡了，才能進入一個新的生產方式；不過渡，則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至於怎麼過渡，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在所有制決定論的框架裡，可以通過激進的暴力剝奪來過渡，也可以通過稍微客氣一點的有補償的國有化（或公私合營）來過渡。在更為廣闊的概念框架裡，這種過渡可以通過資本主動讓步、與勞動合作並分享利潤來實現，也可以通過由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推行勞動產權制度來實現。⁵

謝韜指責列寧毛澤東的暴力社會主義修正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其主要依據，如上所述，是馬恩晚年確曾有過的和平過渡思想，以及謝韜演繹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正統。其矛頭所向，除了暴力革命以外，還包括——甚至主要是——暴力專政。這一點，如果注意到謝韜對毛澤東領導的、通過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

⁴ 經理因從事經營管理決策勞動而獲得的收入，與作為資本控制者分得的利潤，性質上完全不同。但在資本主義企業中，這兩者卻往往糾纏在一起，難以分開。

⁵ 關於勞動產權制度的詳細討論，請參看曹天予編：《勞動產權與中國模式：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挑戰中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年。

1949年革命的認同，在中國問題的語境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革命勝利（即無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後的政治統治形式，沒有系統的論述。他們既提到過“爭得政治民主”，也強調過“無產階級專政”，但都沒有深入展開。不過，有兩點基本思想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作為暴力革命思想的延伸，取得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於不甘失敗、繼續反抗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反革命勢力，必須鎮壓。第二，在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內部，實行民主。

作為基本原則，這兩點思想當然是對的。但要用以指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實踐，卻又顯然不夠。內部民主怎麼實現？對敵鎮壓怎樣進行？特別是，對於廣大的中間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對待？對於這些極為重要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涉及。其原因，除了缺乏實踐上的緊迫性、缺乏歷史經驗以外，還與他們以下兩個並不正確的預設有關係：（1）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階級關係的極大簡化，除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以外，中間階級即使還存在，也已無足輕重了。（2）隨著資產階級的消滅，國家也會很快消亡：國家機器履行的將是經濟職能而不再是政治職能。

可是，複雜的階級關係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中的長期存在，使得國家消亡思想失去了實際意義。在政治生活中，對於上述重要問題的處理，如果沒有系統的法律制度加以明確的規定，不採取一定的形式，沒有應該遵循的程序，勢必帶有極大的任意性，並為政權本身的異化——權力的濫用和新型的剝削壓迫集團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考慮到列寧、斯大林對法制的蔑視、拒絕和踐踏，對不受法律條文約束的施政自由的熱衷，乃至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中間階級

濫施專政，謝韜指責他們修正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也還說得過去。因為，緊接著十月革命的勝利，羅沙·盧森堡等“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立即對列寧否定民主、推崇專政的思想和實踐，提出過嚴厲的批評。

毛澤東的情況比較複雜。思想上，一方面，他對斯大林的錯誤和蘇聯國家機器的異化（“變修”），有所認識；並提出兩類矛盾學說和反修防修理論以求匡正。另一方面，他又完全繼承了列寧、斯大林在政治生活中對法制形式和程序的蔑視、拒絕和踐踏，並補充以他本人特有的、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對群眾暴力的偏愛、鼓吹和濫用。其結果是一種以“大民主”理論形式出現的暴力專政理論。實踐上，他極度誇大階級矛盾，擴大階級鬥爭，並力圖動用群眾暴力來防止、糾正國家機器的異化（“反修防修”）；其結果是，在一段時間內，群眾暴力與國家暴力在全國範圍內的交替使用、結合使用和毫無節制的濫用，使得中國的政治生活，比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還要血腥和殘暴。毛澤東的這種以“大民主”為主要特徵的暴力社會主義，我們當然要反對。但好像沒有必要（也很難）把它稱為修正主義，因為並不存在一種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大民主”的理論。

謝韜認為，暴力社會主義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其哲學根子在於，從空想社會主義出發，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進行了曲解和修正。謝韜說，“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而社會分化和“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則）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杆”；當然，由於社會是“一個矛盾統一體”，進步“同時又包含著退步，出現了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眼點是

前者，⁶ 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後者⁷ 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也就是說，“生產力論”是正統，“階級鬥爭為綱”是修正主義。這是文革後期、改革初期與四人幫進行理論鬥爭、撥亂反正時的一個大題目。

與“生產力論”密切相關的是歷史發展“階段論”。謝韜批評毛澤東“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又說，“在小生產佔優勢、工業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用變動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以來共產黨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這些批評的出發點都是“階段論”。李銳同志則更為明確地說道：“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自然演進的結果。馬克思講過，只有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再不能發展了，生產關係才能改變。”⁸ 改革初期的“補課論”⁹ 和後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其理論基礎就是這個“生產力論”。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意志論，自然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但完全否定主觀能動性、完全否定階級鬥爭在社會進步歷史發展中的推動作用，好像也有機械論、宿命論之嫌。事實上，階級分析、階級鬥爭學說，本身就是唯物史觀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等成對範疇的相互關係問題上，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還原成決定論，似乎有點過於簡單化。

⁶ 指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社會進步。

⁷ 指進行階級鬥爭反抗剝削壓迫。

⁸ 《炎黃春秋》2007年第二期，第13頁。

⁹ 指只有先補上必經的但被人為地跳過的資本主義階段的課，才能建設社會主義。

李銳所說的“自然演進”，如果指的是歷史階段的過渡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那當然是對的。但如果指的是，歷史本身有一條既定的、由界限分明的階段組成的軌道，不走完前一段就不可能進入下一段；或者說，只要前一段走完了，後一段就會自動到來，不需要經過人們的努力或階級鬥爭，那麼這種宿命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有相當的距離。

首先，它不能解釋如下史實：（1）英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時，其封建主義遠沒有發展到最高階段，到了再也不能發展了的地步。因為，正如謝韜早已注意到的那樣，英國直到工業革命以後，直到19世紀後半期中國搞洋務運動時，其國民生產總值還不如封建主義的清王朝多呢。按照生產力論和階段論，英國好像應該首先把它的生產力發展到封建主義的最高階段，至少到清王朝的水平，才可以考慮向資本主義過渡。顯然，要把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塞到生產力論、階段論的框框裡，有相當的困難。（2）謝文開篇就說，美國是資本主義，瑞典是社會主義。但要說美國還沒有達到瑞典已經超過了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恐怕難以令人信服。（3）蘇聯和中國都是在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的。當然，人們可以指責，這種不是經過自然演進，而是通過暴力強制推行的社會主義，正是造成蘇聯、中國落後野蠻的根本原因。但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果真比沙皇俄國還要野蠻落後嗎？毛澤東的中國果然比蔣介石的中國還要野蠻落後嗎？恐怕謝韜、李銳不會這麼看。

更重要的是，“自然演進論”的最大弱點在於，它完全忽視了，歷史階段的過渡，通常總是革命階級在社會危機時期做出決定性的選擇、進行革命鬥爭的結果，而絕不是通過“自然演進”自動到來的。沒有1789年大革命，法國肯定還會在封建制度下生

存下去；沒有十月革命，俄國的資本主義，即使到 21 世紀，恐怕也不會變成社會主義。

從簡單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中演變出來的生產力論和階段論，也被 1950 年代初開始出現的現代化學說取為理論支柱。當前，現代化學說，在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已經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成了觀察歷史、指導實踐、規劃未來的主要理論框架。對此，下面還要做些討論。這裡只想指出，這些概念和學說，絕對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二、歷史經驗

謝文的經驗背景，可以分為國際、國內兩部分來討論。

就國際部分而言，謝韜對列寧主義第三國際的理念和實踐，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對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則贊揚有加。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思想在西歐完全失敗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在社會改良方面，卻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種成功給謝韜以極其深刻的印象，以至於認為它也可以用來規範中國的改革實踐。但在西歐以外，在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列寧主義對於 20 世紀歷史進程的偉大功績，難以抹煞；而社會民主主義對此卻乏善可陳。

對於改良主義在西歐所取得的成就，人們不能忽略使其成為可能的社會歷史條件。首先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經濟和比較完善的議會民主制度，這是人數衆多並且高度集中的工人組織起來、建立強大的工會組織甚至工人階級政黨進行合法鬥爭的基本前提。其次是通過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或其他方式取得的鉅額海外利潤，這是西歐資產階級通過其掌握的國家機器購

買社會安定的經濟前提。¹⁰ 沒有這些政治（民主）、社會（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進行的階級鬥爭）和經濟（鉅額海外利潤）條件的完美配合，改良主義不可能有所成就。這些條件在亞非拉廣大不發達或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存在，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民主主義在這些地區，只是不能充饑的畫餅。

既然社會民主主義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為工人利益而鬥爭的一種改良運動，沒有觸動、更沒有挑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它所取得的成就，在本質上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對已經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的工人階級的讓步。因此，一旦由於某種原因，工人階級的人數有所減少，組織性、戰鬥性有所削弱，或海外利潤出了問題，資產階級就會立即企圖收回讓步。一個眼前的例子：1979、1980年撒切爾、里根先後上臺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內向福利國家頻頻開刀的新自由主義，迅速取代社會民主主義，成為主導政策主流的基本綱領，嚴重地侵蝕著福利國家的根基。

此外，謝文開篇就說，以瑞典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制度，在與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競賽中取得了勝利，改變了資本主義，並正在改變世界。由於謝韜對西方世界並不瞭解，這一斷言與實際情況的距離實在太遠。自1990年代起，瑞典模式的日益衰落，是個不爭的事實。原因十分簡單。經濟全球化使得競爭日益激烈和殘酷。當對手因採用英美模式、頻頻向福利制度開刀而取得競爭優勢時，逼著你向野蠻壓榨工人的底線看齊的壓力，很難抗拒。目前，歐洲奉行社會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法國和德國，也包括瑞典在內，雖然由於政治傳統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對英美模式仍然有所抗拒，但當今世界的主流，絕

¹⁰ 其主要形式和最高成就是福利國家，具體表現為政府主持的各種社會福利項目。

對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英美模式，而不是日漸衰落的瑞典模式。除非出現一個新的工運高潮，由於蘇聯的出局（因而失去了購買社會和平的外部壓力），由於工人階級組織程度和戰鬥性的削弱（因而失去了購買社會和平的內部壓力），¹¹ 西歐改良主義者正在哀嘆的“美國化”過程，看不出有什麼扭轉的可能。

對於蘇聯 70 餘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謝文只以它“消滅私有制”、“排斥先進生產力”，因而“失敗是必然的”一筆帶過。當然，由於蘇聯歷史上發生過大清洗、強迫集體化和意識形態控制，它在工業化、科技發展、公眾福利和社會進步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後冷戰時代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下，早已被抹得不留痕跡了。對於這些成就的評價及其取得的原因，別處再說。這裡只想指出，在評價蘇聯計劃經濟的失敗時，不應該忘記它的兩個基本特點。

第一，蘇聯的經濟一直是戰時經濟。二戰之前，不必多說了。從十月革命一開始，蘇俄革命就在強敵包圍之中。丘吉爾要把它“扼殺在襁褓之中”所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消滅蘇俄（蘇聯）的決心（和行動），使得聯共領導具有強烈的危機感，備戰的緊迫性壓倒了一切其他考慮。二戰以後，還是由丘吉爾起的頭，西方迅速地對蘇聯展開了冷戰。美國的原子外交、核彈威脅，逼得蘇聯不得不保持戰時經濟以支持耗費昂貴的軍備競賽。戰時經濟的特點是，政府主導，統制一切；軍工為主、支撐軍工的重工業為主；大量資源被政府強制地用於軍工產品的生產。¹² 這樣做的後果之一是，迅速發展的蘇聯經濟，雖然足

¹¹ 其起因是知識經濟的興起所引起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即藍領階層人數的急劇減少和工人集中程度的降低。

¹² 里根星球大戰的目的之一，就是用軍備競賽來拖垮蘇聯經濟。現在西方許多學

以生產大量的核彈、衛星、火箭、導彈等軍工產品、高科技產品，使蘇聯在軍事上成為能與頭號帝國主義美國分庭抗禮的超級大國，但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卻排不上號，呈現出短缺經濟的種種特點。

第二，蘇聯工業化所需資金的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不是依靠對外掠奪和搶佔殖民地，而是完全依靠內部積累。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剝奪了農民；而高積累低消費方針下的工資政策，也強行壓低了工人的生活水平。這樣依靠犧牲工農完成的內部積累，由於社會內部的相對平等，長期以來並沒有引起很大問題。可是，到了1980年代，對西方一開放，蘇聯的低消費、短缺經濟與西方消費社會的反差太大，於是引起了不滿和幻想：何不轉軌搞資本主義、享受享受豐裕的物質生活呢？¹³於是就搞休克療法；於是鉅額的公共積累迅即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於是就有了消費社會？好像迄今為止還沒有到來。

就謝文經驗背景的國內部分而言，對於1949年以前的革命經歷，謝韜、李銳沒有否定的意思。五四倡導的科學民主和自由，反帝抗日、武裝反蔣，都好得很。一貫追隨蔣介石的胡適，現在被一些人捧上了天，李銳卻並不掩飾對他的討厭。

謝韜、李銳投身革命，是出於熱血、出於理想（自由民主救亡等等），而不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戰，以求生存和解放。這在1949年前不是個問題。1949年後，有了土改合作化，有了公私合營、勞保福利、鐵飯碗，有了工農社會地位的提昇、初等教育的大發

者，把蘇聯的垮臺歸功於里根的“英明”決策，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¹³ 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早期出國的中國學者官員身上。一進西方的超級市場，他們就被征服了：“看看這琳琅滿目的消費品，資本主義就是好！而我們的社會主義呢，真是一團糟！”

展、收入的大體拉平和平等意識的普及；¹⁴ 可是言論自由、政治民主乃至基本人權的保障，卻好像沒有多少。謝韜、李銳的感覺與工人農民就有了些不同。殘酷整人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謝韜、李銳身受其害的 1950 年代中後期的胡風、廬山兩大冤案，更是為他們對毛時代的觀感提供了一個特定的視角。他們對毛時代人權、自由、民主權利的缺失，有切膚之痛。但是不是因此就該得出結論，反蔣反錯了呢？現在不少歷史學家正在轉彎抹角地說“是”。謝韜、李銳好像沒有這個意思。在他們看來，反蔣並沒有錯，只是共產黨還應該實行憲政民主。以前沒實行，現在實行還來得及。

對毛時代的經濟怎麼看？¹⁵ 從“階段論”出發，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改造是個嚴重錯誤，後患無窮。真的嗎？如果沒有社會主義改造，沒有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有沒有可能在短短的十幾年內，建立起一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沒有這麼一個體系，光把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本家請回來，是否就能實現經濟起飛？這些問題值得經濟史家好好做些實證研究，把因果關係弄清楚。

如果不談實證研究，光從理論上看，在制度變遷問題上，“階段論”的說服力也不是很強。1950 年代初，按照蘇聯模式的理念，搞了三大改造，把整個國民經濟納入公有制計劃經濟的軌道，經濟上不但沒有造成災難，從 1952 到 1978 年，國民收入還翻了五

¹⁴ 由於平等主義的話語霸權，連極端封建不平等的“出身論”的鼓吹者，也得找個平等主義的藉口：出身剝削壓迫家庭的子弟應被歧視，是因為他們總是企圖復辟不平等的舊社會；而紅五類子弟之所以應該享有“特權”，是因為他們天然是在追求平等社會的革命接班人。

¹⁵ 蘇聯經濟的兩大特點（戰時經濟和內部積累）及其後果，同樣適用於毛時代的經濟，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番，綜合國力大為增強。怎麼回事呢？制度變遷成敗的決定因素，並不完全取決於生產力的水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之有關的社會利益的力量對比，取決於這些力量的（思想）動員和組織程度。在當時的中國，有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完整的蘇聯模式當樣板，說過渡也就過渡了。

當然，後來在經濟上還是出了問題：1950年代末的大躍進和三年大饑荒。但那是另有原因，與社會主義改造無關。這一段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經濟災難的起因並不是毛澤東推行蘇聯模式。恰恰相反，毛澤東對蘇聯模式極為不滿，力圖跳出它的框子，闖出一條新的路子。毛澤東把蘇式計劃經濟等同於官僚主義者用來壓制群眾創造性的條條框框。他想用政治動員、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經濟，打破條條框框，解放群眾的創造力。毛澤東用意志論來挑戰蘇聯模式，結果捅了漏子、闖了大禍。撥亂反正的意思，本來是指從毛澤東的做法回到蘇式計劃經濟。毛氏做法，成也好，敗也好，只與如何理解計劃經濟、¹⁶ 如何理解群眾創造性有關，而於社會主義改造沒有一點關係。

毛澤東是否喜歡暴力、好戰？出兵朝鮮是因為美國打到了大門口；援越抗美，也是有拒敵於國門之外的意思。炮轟金門馬祖，不惜與美國直接對抗；堅持發展核武器，惹惱了赫魯曉夫；在在表現出不畏強暴的民族精神；雖然是以邊緣政策對邊緣政策，卻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謹慎從事，不輕易點燃戰火。

中蘇論戰，兩個社會主義大國，說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骨子裡都有民族主義因素在起作用。同樣不容置疑的是，除了民族意氣之爭而外，雙方對世界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理解，確實也有實

¹⁶ 毛澤東從來沒有想用市場經濟去取代蘇聯模式。

質性的分歧。現在的問題在於，兩個“暴力社會主義者”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在打架，哪一位是更正統的暴力社會主義者呢？

文革的情況好像比較清楚：煽動群眾暴力，大搞政治迫害。可是仔細考察一下背後的理念，卻又有大眾參與和反對、防止黨政機器異化的根本考慮。

反對文革當然是對的。文革中整人時無法無天，那就應該建立法制、保障人權。但能否因為文革號召群眾參與政治鬥爭，就該剝奪群眾參政的民主權利了呢？能否因為文革中黨政官員受到過造反派的衝擊，現在的官員們就可以放心貪腐、不必再接受群眾的監督了呢？文革的錯誤為改革開了路、為改革提供了正當性。可是如果改革只是對文革的簡單的否定，事情也會走到反面：改革也許會倒過來給文革的正當性提供一個事後的證明。現在不是有許多人在問：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真的不存在嗎？黨政官員中真的沒有走資派嗎？簡單地否定文革，不能合理地解釋文革中殘酷（鬥爭）現象背後的動因，不能解釋文革中暴露出來的種種複雜的社會矛盾，包括幹群矛盾（或國家機器的異化），因此也就不利於這些矛盾的恰當處理。

為改革開道的思想解放運動，主題是破除對毛的迷信，意義鉅大，影響深遠。“階級鬥爭為綱”被“經濟建設、四個現代化”所取代。市場經濟（當時叫商品經濟）挑戰計劃經濟的呼聲愈來愈高，從而為日後的經濟改革定了方向。毛澤東的大民主理論被徹底否定，建立法制、保障人權成為共識，並以取消文革中嚴重侵犯人權的“四大”為第一步。當然，對於把“四大”當作自由化來反對，左右兩派對此都有微詞。沒有了“四大”，群眾的民主參與權利怎麼來保障？反對自由化是否限制了言論自由？在政

改方向上的含糊，為日後的分歧埋下了種子；¹⁷ 但在當時，對於健全法制的努力，大家都是歡迎的，儘管民主在政治改革的日程上還排不上號。

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當代史中的轉折點。由此為契機，中國的政治精英，用現代化取代了革命，作為自己的綱領和旗幟。先是打開局面的實幹，然後是一步步地在經濟、歷史、文化、政治等領域建立話語霸權，最後則是換旗。謝韜的文章，是近年來換旗運動中的一個高潮、一份最為明確的宣言。

整個說來，對於毛時代，謝韜、李銳正確地看到了其施政方式的失誤：拒絕法制，把群眾暴力當作民主；但對其施政內容，即主要為哪個階級服務，卻注意不夠。反右、文革，都是階級鬥爭擴大化，打擊了不該打擊的人；但卻又都體現了支持工農群眾、反對精英（知識分子和官僚）霸權、追求社會公正的時代理念。儘管思想解放運動把中國引入了一個非毛化的時代，但官方並沒有正式地全面否定毛澤東的遺產。其結果是，毛的某些理念，不僅有力地制約了改革中的新自由主義傾向，同時也為一般群眾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抗議，提供了合法的依據。

全面否定毛時代，是“否定毛文革”這一社會思潮（和運動）的一種特定的繼續。¹⁸ 其結果和歷史意義，只能是對1949年革命的全盤否定。總結歷史經驗，往往蘊涵著一種探索：有無不同的路子可走？對1949年革命的否定，其目的，當然是為了論證一個新的起點，一條新的通向未來的道路。這一點，在對改革的歷史評價上，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¹⁷ 清污運動所透露出來的政改思路，比思想解放運動要清楚得多：即否定國家機器異化的可能性，這就從根本上為全面蛻變提供了保護傘。

¹⁸ 否定文革還可以沿著別的方向進行。但這在改革時期不是主流，這裡暫且不論。

三、改革：回顧和展望

十年動亂，到了最後，已是天怒人怨。在一個階級對抗已經消滅了的社會中，還要以從顯微鏡和望遠鏡中尋找出來虛幻的階級鬥爭為藉口，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縱有毛的威望，時間長了，也是不得人心；一旦能夠從中擺脫出來，安心從事經濟建設和科學研究，誰能不擁護！“階級鬥爭”概念只是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中，還有某種抽象的存在；在現實生活中，政治判斷和意識形態判斷的最終標準，已經不是革命和階級鬥爭，而是發展生產力、實現現代化。標準的這種轉變，在文革剛剛結束的語境中，是那麼的得人心，因而其實現是既平穩又自然。

要把生產力從毛氏“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順理成章的應該是回到（以階級鬥爭熄滅論為基礎的）蘇式計劃經濟。可是蘇聯模式由於其種種弊病，特別是低效，不僅在中國，就是在蘇聯，也已經有人想有所突破了。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經驗和直覺，使他在經濟學界有關改革的探討、論戰中，有意無意地支持市場取向的一方。沒有鄧小平的支持，學者空論，能有多少結果？

可是市場，特別是與之密切相關的私有制和雇工剝削，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絕對是離經叛道。鄧小平和他的智囊們，由於一時沒有能力為市場取向的改革，作出有說服力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證，於是就只得動用執政權強佔話語權，宣佈“不爭論”，“發展是硬道理”。

為了發展，鄧小平不惜打破禁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鄧氏施政，又豈能完全不受毛氏理念的制約？於是在“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施政口號後面，又加上了

“消滅剝削”、“共同富裕”的許諾。“先富”政策的門一開，不多久就變成了現實，並迅即演變為惡性的社會兩極分化，致使人心浮動、社會動蕩、群體事件層出不窮、各級政府疲於應付；而“消滅剝削”、“共同富裕”的許諾，卻成了談助笑柄，有幾個人把它當真？這一情況的出現，並不能完全歸因於市場的內部邏輯；¹⁹ 更重要的原因是，社會轉型時迅速形成的各種權勢集團，在（改革環境中的）利益博弈時的強勢運作和巧取豪奪。

這裡，不能不提到改革所經受到的、與毛氏理念的約束截然對立、但卻更為剛性的約束，即全球化對中國改革所施加的結構性約束。中國改革的重要一環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開放。在引進外資、出口導向、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發展政策導引下，中國經濟日益加速地捲入全球化過程，被迅速地整合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淪為跨國資本的附庸，成為外資控制下的、為發達國家製造廉價消費品的加工工場乃至血汗工廠。在這種情況下，“與（資本主義世界）國際接軌”，經由買辦官僚權勢集團的中介，成為不可違背也無法抗拒的剛性約束，專橫地制約著中國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乃至政治轉型。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政治邏輯，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迅速地展示出了它們的全部力量。階級、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和階級對抗的重新出現，只是這種邏輯的必然結果而已。

想當初，以四化和民主法制建設為目標的改革，被定義為是

¹⁹ 傳統左派反對改革，自由派力圖把改革拉到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所依靠的，主要就是這個“市場邏輯”。進一步的討論，參看〈勞動產權與改革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二期，第111~117頁）。

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面對現實，沒有忘記這個定義的人們，在“反思改革”的名義下，對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正當性，提出了無情的質疑和嚴重的挑戰。

對於 28 年的改革，到底應該怎麼看？“自我完善”這條標準還是太過空泛，因為什麼是應該“自我完善”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本身，在這 28 年中，已經大大地走了樣。更為簡單的標準好像是：看一看誰在改革中得了利益，誰在改革中受了損失？這種利益重新分配的新格局是怎麼發生的？是公平的嗎？從哪些人的角度看來是公平的，從哪些人的角度看來是不公平的？循此以往，改革的未來又會是怎樣的呢？哪些人對改革的現狀未來表示歡迎嚮往，又有哪些人對此感到忿忿不滿？在我看來，離開了對這些具體問題的具體回答，對改革的任何評價和解讀，不是故意糊弄人，就是不著邊際的隔靴搔癢。

按照這一標準，轉軌為市場經濟，即使是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重大修正，也應該熱烈歡迎。為什麼？它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不僅使國民經濟總產值翻了幾番，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四億多的人口脫了貧。轉軌使那麼多的人受益，能不歡迎？當然，對於這裡所說的“生產力的解放”，應該做些保留。從生產力的外部（物質）指標（即產值）來看，改革使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發展這一事實不容置疑。可是，如果看一看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即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則進步並不太大。其結果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贏家，首先是控制著知識產權的跨國資本，其次是與加工出口有關的各類資本，而真正能夠提供內需的、出賣血汗的勞動者，則所得無幾。這是改革的一個極大悖論；長遠來看，也是一個嚴重的隱患。

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活領域內，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不

搞大的運動、不整大批人，公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這個歷次政治運動的主要受害者）的基本人權和其他各種自由權利，得到了法律的保護。這方面的進步，舉世公認、有口皆碑；並且可以期望，情況會變得愈來愈好。

可是，直接影響億萬群眾日常生活的醫改、教改、房改，由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政策方針與有關部門官員的設租尋租行為的曖昧結合，在為一些人開闢源源不斷的財源的同時，卻使一般老百姓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因而怨聲載道。

更為嚴重的，當然是官商結合，在優化資產結構、建立現代企業的名義下，瓜分國企資產，使原先以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存在的社會主義家底，迅速地轉換成資本家用以剝削勞動者的私有財產，同時把大批國企職工拋向街頭，使之淪為社會邊緣群體，引起了社會的動蕩。²⁰“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是企業和國家的主人翁”，完全成了一句空話。“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這一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的基本屬性，已經不復存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政治基礎，即共識和穩定，不再能像先前那樣，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就在那兒，而是成了一個必須嚴肅對待、認真處理的大問題。

與之密切相關的是，改革在全球化的剛性約束下走上的發展主義道路，已在生態、資源和環境等方面付出了鉅大的代價，從而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遇到了一系列瓶頸約束。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在理論上較好地回答了這些問題；能否落實，則取決於抵抗發展主義的決心和能力：沒有高速的經濟發展來支撐某種程度的“購買社會和平”，目前這樣高度兩極分化的中國社會，

²⁰ 改制過程中，原先存在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實際上的崩潰，對那些下崗職工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能否維持社會安定，是個不得不讓當局擔心的大問題。

改革之初，為了打破“階級鬥爭為綱”的桎梏，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到了今天，改革中出現的上述種種消極方面，已經對現有的改革方向的正當性，甚至對推行改革的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簡單地重複“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不足以回應挑戰，因為挑戰的基本依據，本來就是現有的改革模式、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問題。要恰當地回應這一挑戰，改革派必須提出新的模式來規範改革的未來。謝韜認為，改革的最佳模式只能是作為馬克思主義正統的社會民主主義。

前面說過，社會民主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不過，決定取捨的根本理由不在正統與否，而在它的具體內容。謝韜認為，社會民主主義代表了工人、全社會和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它的目標是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調節分配、消滅三大差別，從而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它根據普世（文明）價值（私有財產、個性、人權、自由、理性、民主等等）的要求，實行憲政民主、建立福利國家，放棄冷戰思維、化解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實現階級妥協階級合作、調動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積極性，通過和平漸進非暴力的途徑，過渡到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謝韜的結論是，工人階級的解放，不可能通過革命，而只能通過資本主義在社會民主主義框架中的高度發展，才能實現。

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下面再說，這裡先講一下階級合作。階級合作不僅可能，而且是階級社會得以存在的先決條件。問題是合作的基礎和條件。如果工人或者代表工人的工會，在法律的約束下、在老闆的控制下，順從聽話，合作當然不成問題。如果老

閩經理在工人或工會或公方代表或黨支部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地服從領導，完成交付的任務，合作也不會成問題。可是，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總有一方的心情不那麼舒暢。能不能讓雙方都心情舒暢？當然能了，如果雙方沒有利益對抗的話。可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框架裡，社會公平是通過福利國家的二次分配來實現的。在初次分配時，工人只拿工資，資本家是贏家通吃，全部利潤歸己。在這種情況下，階級利益怎麼可能不對抗？有階級利益的對抗就會有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和社會思想史家赫施曼（Albert O.Hirschman）有句名言：社會衝突是民主市場社會的支柱。在存在著對抗性階級利益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裡，談階級而不提衝突鬥爭，或談衝突鬥爭而迴避其階級內容，都不能恰當地理解，為什麼在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裡，階級合作能夠搞得比較好、比較成功：其前提是西歐的工人組織起了強大的工會，與資本家作了長期、有效的階級鬥爭。

東歐的一些人，在劇變前後，也想要社會民主主義，但得到的卻是腐敗和新自由主義。怎麼回事？就因為在東歐不存在那個前提。要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是自由主義。在政治法律上，這就表現為，對國家權力和公共權力，法律會有各種有效的約束和控制，而對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私人權力，卻是毫無約束可言，全憑當事人的博弈。空談以市民社會來取代權威統治、以社會民主主義來取代斯大林主義的東歐書生，面對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財產權力）的資產階級，在博弈時無牌可打，得到的只能是最糟糕的資本主義。

那麼，換旗，或把社會主義換成社會民主主義，即把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作為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或經濟基礎，並對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作相應的調整，實行憲政民主、建

立福利國家，在當前的中國，意味著什麼呢？那只能意味著放棄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接受重新出現的資產階級的剝削和控制。至於能否從資產階級那裡取得一些讓步，從未來的福利國家的二次分配中得到一些補償，那得一看資本家的好意，二看自己的鬥爭能力了。資本家當然也會有好意。但是不是永遠靠得住，卻就不好說了。萬一他們也推出一個里根、撒切爾當頭，翻臉不認賬了，象當前在英美等國那樣，怎麼辦？如果中國的工人階級自己有能力去鬥爭、去取得讓步、不讓不認賬，那又何必把自己現有的權利權力拱手讓人、然後再去求人施捨呢？

在社會民主主義問題上，謝韜的主張，從整體上說，難以令人接受。但他的主張中，有一點基本意思卻是對的。那就是，既然要搞市場經濟，那就得承認資本產權；於是勞資合作就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如果社會民主主義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框架，什麼樣的框架才是合適的呢？

四、概念框架

蘇東劇變前後，中國、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世界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者乃至一般左派，對價值和目標開始重新定向、重新定位。這一過程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爭奪話語霸權的鬥爭。鬥爭的焦點是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其結果是，在觀察歷史、指導實踐、規劃未來時，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範式，在世界範圍（包括中國）內，被自由主義的現代化範式所取代。²¹

²¹ 西方學界還有個後現代派，把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稱為現代派而加以反

馬克思主義認為，基於科技工業大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鉅大的進步，為人類解放提供了生產力的前提。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雇工剝削勞動異化，必然引起矛盾和衝突。只有通過革命，超越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真正實現人類解放。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簡單地否定資本主義現代性（其基本特徵是面向未來、立足理性、追求解放），只是認為它必將被超越、為更高形式的現代性，即社會主義的現代性，所取代。也就是說，社會主義也是面向未來、立足理性、追求解放的。只是在社會主義現代性中，個人解放將被集體解放（通過工人鬥爭、反殖鬥爭、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革命而實現的階級解放、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所取代，個人理性、工具理性將服務於集體理性、價值理性確定的目標。

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以美國經驗為樣板的現代化學說，初次出現於1950年代中期。它是冷戰的產物，又直接為冷戰服務。二戰以後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由於其直接、間接地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並大多為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所吸引，極大地改變了冷戰的戰略態勢。作為回應，美國的冷戰騎士，在美國政府的直接支持下，提出了現代化理論，把經濟的起飛發展，以及一系列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的“現代化”指標的逐步實現，說成是人類進化的必由之路，並以之來與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模式相對抗，爭奪中間地帶。²²

對。但其矛頭主要針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階級觀和目的論的歷史進步觀，對於馬克思主義在學界影響的衰落，有點影響。對於自由主義，特別是體現在全球化話語中的新自由主義，後現代派可以說是毫無影響。

²² Michael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根據現代化理論，革命，或者是對正常的現代化過程的偏離，最終還得回到現代化這一人類文明主流中來；或者是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某一階段（如完成民族整合、建立發展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民族國家，又如落後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可用工具，階段走完，目的達到，工具就該扔了。

那麼，到底什麼是現代化呢？簡單說來，就是美國化。在 1950 年代，現代化指的是市場經濟、代議民主和當時美國還奉為主臬的羅斯福新政式的福利社會。到了冷戰結束後的 1990 年代，羅斯福的新政新自由主義，已被布什、克林頓完全不同的、實際上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所取代，現代化中的福利社會一項，也就被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各領域的全面私有化所代替。這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並以全球化為其具體實現形式。普天之下，概莫能外。

為什麼？因為現代化符合人性的根本願望，實現了普世的文明價值，如私有產權、個性、人權、自由、自決、理性、容忍、民主等。

可是問題在於，普世價值其實並不普世，只不過是當代西歐、北美一些局部地區近世以來流行的價值觀念而已。撇開其他地區不談，就是在歐洲古代和中世紀，崇尚的也不是個性和理性，而是倫理責任和宗教信仰。就是在 20 世紀的西歐，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國，是不是也把民主自由個性當作最高價值來追求，好像也是個問題。美國能容忍南方自決獨立嗎？中國能容忍臺灣、西藏自決獨立嗎？

其次，普世價值之間經常起衝突。起了衝突怎麼辦？誰來裁判？比如說言論自由和不讓種族歧視，都是當代歐美流行的普世價值。有人要發表種族歧視言論，能給這個自由嗎？所以，價值

的背後是權利，權利的背後是利益。普世價值只不過是給局部的一時的世俗利益披上的一襲神聖外套而已。

可是不管怎樣，馬克思主義在這場話語鬥爭中確實輸了，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結論。究其原因，是否因為蘇東劇變、中國要改革，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的和平競賽中失敗了？當然，失去政權的支撐，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是個極大的打擊。但關鍵還在理念。儘管馬克思主義不能被歸結為社會主義。但沒有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模式，馬克思主義還能有什麼吸引力呢？可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念，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這就是否定市場。一個子下錯，整盤棋就輸了。

輸了，不等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念整個就是錯的，也不能因此而證明自由主義的價值真的就是普世價值，或者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真的就是人類歷史不可逃脫的終結。它只是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必須按照市場的必要性作出重大的修正和發展。但在轉入這一主題之前，先來看一下，上面提到的範式轉換，在中國是怎麼發生的。

前面提到過，改革的理論基礎是生產力論和階段論，直接目標是社會穩定（安定團結）、發展生產力。用的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但無論在用詞上還是在實際內容上，它與1960年代初即已引進的、現代化理論奠基者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論》一書中的用詞和觀點，卻極為接近。到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這一論斷時，革命與解放的話題消失了，發展或現代化成了主題，現代化範式在中國的主流話語中，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霸權。

確實，從1980年代起，發展成了熱門話題，而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卻不再有人提起。但這並不等於“革命與解放”就整

個地從地球上消失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不管是用軍事手段進行的政權更迭，還是通過顏色革命來推翻社會主義政權，一直在不停頓地進行著，其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專制暴政中解放出來。這場正在不停頓地進行著的革命，其最終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完成現代化，即把資本主義核心地區以外的部分納入依附性的現代化軌道，在國際分工的名義下，以結構性的不平等的形式，對這些地區，實行新殖民主義剝奪，並用現代化的話語來改寫殖民主義的歷史，以建立起資本帝國主義的歷史一貫的道義正當性。

應該說，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首先是經濟上的，但同時也是政治上的）全球化，特別是由於在發達國家的利潤率下降和資本過剩導致的資本國際大轉移這一不可逆轉的趨勢，確實為落後社會提供了現代化的機會。中國的改革，抓住了這個機會，成了得益者。比起中非地區的失敗者來，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成功了。人們在大談中國的崛起。但是，成功的代價呢？屈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主義霸權，改寫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放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

有沒有可能又享受成功又堅持理想呢？當然可能了。但是，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必須放棄；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即超越資本主義：反對僱傭勞動、取消結構性的不平等、實現社會公正）的前提下，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作出重大的修正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繼承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要消滅剝削，消滅三大差別。這個理想必須堅持。但要實現理想，不是回到前資本主義的農業社會，而是利用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科技工業大生產，在這基礎上繼續前進。

馬克思主義贊同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經濟、實行社會保障、以

福利國家形式實現再分配公正的主張；但並不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要從社會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還得取消僱傭勞動制度、消滅剝削。

馬克思原來的理論，蘇聯和中國過去的實踐，把社會主義等同於公有制加計劃經濟。這一條必須徹底放棄。計劃經濟的理論設想不乏誘人之處，但其歷史實踐的績效表現卻令人失望；而市場機制，在信息處理和資源配置上，卻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因而必須成為社會主義新模式的一塊基石。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觀念上的這一突破。至於公有制，它本身並沒有消滅僱傭勞動和剝削，只是使僱傭勞動和剝削採取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而已。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對公有制的盲目崇拜，與自由主義者對私有制的盲目崇拜一樣，都是因為有個所有制決定論在作祟。決定經濟制度的社會性質的因素，並不像斯大林想像的那樣，只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政治、法權制度等上層建築，對於財產關係的性質，往往比所有制本身更為重要。這一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關係辯證法的觀點，在下面討論勞動產權時，可以看得很清楚。

什麼是勞動產權？簡單的回答是，勞動者對於自己（通過勞動）創造的財富擁有財產權，即有權參與剩餘或資本增量產權的分配。但有必要首先明確一下，什麼是勞動？勞動，指的是勞動能力與勞動條件結合創造財富與價值並體現為一定時間量的活勞動過程。由於勞動力只有與生產資料結合，才能創造財富，合乎邏輯的結論只能是，兩種勞動（或生產）要素——活勞動（勞動能力的使用）和勞動條件——同時對財富和價值的創造做出了貢獻，其擁有者都有權參與創造出來的財富或剩餘或資本增量產權

的分配。也就是說，勞動產權論²³ 既為按要素分配²⁴ 提供了理論基礎，又為勞動者參與管理提供了產權基礎。

但是，勞動產權論者特別強調的是，由於勞動者提供的活勞動，是使作為價值和剩餘價值創造唯一源泉的勞動過程得以進行的主體基礎，勞動者享有的勞動產權，是其不可讓渡、不容侵犯的基本權利，應該在憲法文本中有充分明確的表述，從而使其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尊重，並在法律上得到政府的保護。

顯然，勞動產權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要有效運作，必須有一整套的政治（憲政民主）、文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社會（參與制和福利保障）制度和安排作配合。²⁵

首先是憲政民主。這其實也是謝韜、李銳關心的焦點。他們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這話絕對正確。但是，實行憲政並不等於就有了民主。憲政只是從形式和程序上，制約政府的

²³ 有關勞動產權較詳細的討論，請參看曹天予編：《勞動產權與中國模式：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挑戰中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年；李惠斌著：《企業勞動產權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6 年；曹天予：〈勞動產權與改革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 年第二期，第 111~117 頁。

²⁴ (a) 按要素分配是對所有制決定（分配）論的否定。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勞動產權論和按要素分配在理論上的出發點是：分配制度是特定的社會政治倫理規範及相應的法權體系總和的產物，而並不是先天地取決於生產資料的歸屬。關於所有制~產權與社會規範~政治法律制度間關係的更一般的討論，參見曹天予編：《勞動產權與中國模式：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挑戰中發展》，第 8~10 頁。(b) 同時，勞動條件或生產資料或資本，作為過去勞動的產物，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只是物化了的勞動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看作是內容完全相同的兩個概念。

²⁵ 關於參與制和社會保障，請參看林春：〈小康社會主義的公共政策構想：勞動、參與、社會保障及其它〉，曹天予編：《勞動產權與中國模式：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挑戰中發展》，第 356~374 頁。

權力、消除任意施政（專制）的可能，確保公平，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唯法主義者的根本錯誤在於，他們完全不注意憲政的內容，即保護什麼、不保護什麼。撇開君主立憲式的憲政不說，即使是保護私有財產、契約自由、雇工剝削自由的自由主義憲政，和保護勞動產權，保護公民的工作權、福利權和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憲政，其內容，其所奠基的社會的性質，也是南轅北轍。

更為重要的當然是民主。沒有民主，憲政能有多大意義？但什麼是民主？誰都知道，民主的本意是人民主權，即凡事人民說了算。但誰是人民？官員企業家，還是藍領、農民工？在當前的市場經濟階級社會裡，誰享有主權誰說了算？行使民主權利的基本前提，即享有教育權、知情權、話語權，甚至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都得有經濟實力作後盾。任何憲政，如果不能確保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人口的絕大部分或人民的主體）行使民主權利的經濟前提，那不管精英們把話說得多好聽，只是騙人的鬼話；把條文訂得多細緻、多嚴謹，只是一紙騙人的空文。你怎麼能確保人民有行使其主權的能力呢？

憲政民主必須實行。但首先得在理念上把其基本內容，即國體是什麼？主權在誰？向人民交待得清清楚楚，取得他們的同意，然後才談得上文字表達和制度建構。可是要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精英們怎麼肯放棄他們的黑箱操作？這是他們的特權呀！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民主得靠自己的鬥爭，而不可能來自別人的恩施。加拿大民主福利國家的設計師、哈佛訓練出來政治經濟學家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在鼓吹提倡福利民主和普選權前，曾受僱於洛克菲勒財團，去幫助他們度過由 Ludlow 1914 年煤礦工人罷工引起的政治危機。工人鬥爭的堅決，迫使他認識到，只有實行普選、民主、建設福利社會，才有可能弱化工人階

級的動員和鬥爭，確保資本主義的社會和平。為什麼我國廣東的血汗工廠裡，既沒有福利，更沒有民主？道理很簡單。那裡的工人沒有也不讓組織起來與資本家進行鬥爭。

這樣說，並不是要鼓動工人起來搞暴力鬥爭。而是說，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在確保工人利益的前提下，部署與資本家的階級合作。當然，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裡，政府的主導作用遠遠不止這個。除了企業的日常經營和內部事務，政府不應干預外；對於經濟的宏觀平衡、壟斷的防止、公共物品的提供、外部性的處理，對於再分配公正的確保，特別是對於恰當的發展戰略的制定、民族產業的保護和民族經濟的發展，政府必須積極干預。而對於勞動產權這一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則政府必須在憲法基礎上，竭盡全力加以保護，以保證市場經濟的發展沿著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前進。

可是，我們不是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嗎？初級階段的任務不就是發展生產力嗎？如果容許剝削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怎麼能在現在就要消滅剝削呢？應當承認，初級階段概念的提出，有其歷史意義。它用階段論的語言，否定了只要計劃的傳統觀念，論證了市場機制的必要性。可是，一旦認清了必須用市場來取代計劃，它的歷史任務就已經完成了。繼續談論初級階段，有害無益，因為它蘊含著兩個錯誤的設定。第一，處於初級階段，意味著不管什麼，包括資本主義僱傭剝削在內，只要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就可以容許、值得提倡、應該保護。結果是只有初級階段，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成了放棄社會主義底線的藉口。第二，到了高級階段，就可以也才可以不要市場、只搞計劃經濟。如果經濟生活的現實，表明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這就倒過來為初級階段的長期性甚至永恒性，提供了“論證”，也就是說，為保

存資本主義僱傭剝削提供了永遠不會過期的合法性。

社會主義從計劃模式轉向市場模式，既引起社會利益的分化組合，又牽涉到一系列深層的理论問題。各派勢力紛紛提出自己的轉型方案，意在奪取轉型定向的主導權。於是，話語鬥爭勢在難免。話語鬥爭的背後，當然是社會成員實際利益的鬥爭。但社會成員，如果沒有文化觀念的動員，沒有理論綱領的引導，就不可能組織起來採取行動，就只能任人宰割。在這個意義上，當前的話語鬥爭，對於轉型的方向，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話語鬥爭的特點是，各派力圖也必須與主流話語掛鉤，對其作出特定的、有取有舍的解讀。一旦特定的解讀成功，主流話語本身也就發生了變化。循此以進，沒有盡頭。改革之初，生產力論、階段論就是對於當時主流話語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特定解讀。生產力論解讀的成功，使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蛻變成現代化理論的另一種說法。

當前的中國，話語鬥爭的形勢極其複雜。官方的主流話語名義上是馬克思主義。由於國際大環境和改革二十多年來走過的道路，實際上的主流話語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導向的改革，產生了種種惡果，²⁶ 已經引起廣大下層群眾的嚴重不滿。這種不滿，可能被各種不同的觀念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歷史上，社會危機時期下層的不滿，曾經被動員組織成國際共運，也曾被法西斯運動所利用。當年的文革暴力，難道真的只是四人幫倒行逆施，

²⁶ 比如，許多國企改制，成了國企高官變相瓜分國有資產，導致大量職工失業、淪為社會邊緣化的族群；城市醫改，竟引起醫療和藥品價格狂昇，成了草菅人命的斂財；藥管系統的貪腐大案和各地的礦難弊案，暴露貪官惡吏奸商合流的狼群現象；地方官與開發商哄抬房價、地方官府行政收費罰款無度、教育界濫收費用，經濟持續高增長背後的這些脫序亂序現象，以及世界上最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福利制度的崩潰，都是新自由主義主導改革的結果。

而與下層不滿沒有關係嗎？現在的任務是，如何把這種不滿及其背後的社會力量，動員和組織到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去。

為此，就需要新的觀念，需要理論創新。比如，上面提到的勞動產權，就是一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理念。但是，現在一提理論創新，人們想到的往往是“吸收一切文明成果”，特別是與現代化生產規律有關的經營管理方式；也包括傳統美德，如儒家倫理中的“己所勿欲、勿施於人”；還要求把傳統美德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²⁷ 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式和封建主義的倫理道德，都老掉牙了，為什麼說是創新呢？真正的原因，其實只是因為它們與 1949 年後的主流話語不同。於是理論創新本身成了話語鬥爭的一部分，其背後則是政治經濟利益和權力的鬥爭。

看清理論創新的話語鬥爭實質，及其經濟政治利益背景，對於理解理論概念（如“發展生產力”、“國退民進”、“物權”、“民有”等等）的挪用、誤用和濫用，大有好處。但這並不排除純粹認識上的不同看法。

比如，謝韜、李銳追求的勞資合作基礎上的憲政民主、人權保障、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等目標，本來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得到實現。但由於他們不是把勞動產權或勞資雙方在經濟地位平等條件下的鬥爭，而是把資本主義本身，誤認為是勞資合作的基礎；而把對資本主義制度固有惡果的消除，寄希望於福利國家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於是就提出了換旗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可是，由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是自由主義，而在當前，自由主義的最為強勢的形式是新自由主義，倡導社會民主主義的實際結果，得到的只能是新自由主義。在當前中國的語境下，用新

²⁷ 這種結合是否可能，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已經大成問題：市場競爭中誰也不願意失敗；在這種情境下，誰能做到“己所勿欲、勿施於人”呢？

自由主義來主導改革和現代化，就算成功了，其結果也只能是殖民地性質的現代化：耗盡資源、摧毀環境的發展主義，為發達國家生產廉價消費品的加工工場，國內則兩極分化、階級對抗。當然，謝韜、李銳心裡可能還有一個階段論的問題。階段論固然看到了生產力水平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制約作用，但卻沒有看到更為重要的人們在文化動員、理論指導下創造歷史的能力。把這些道理說清楚了，我想謝韜、李銳不見得非要社會民主主義不可。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好呀？

有人會說，你這個勞動產權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如果因為社會主義還沒有實現而把這一理想稱作烏托邦，那這個烏托邦有什麼不好呢？人們總得有個理想吧。問題是，你的那個新自由主義也是個烏托邦，而且是個偽烏托邦。所謂的涓滴效應（餅做大了大家分享），沒有生死鬥爭，從來也不會自動生效。